

由州縣學記析探宋代士人對 三代聖治的實踐與反思

郭玲姘

元智大學通識教學部兼任助理教授

提 要

州縣學記，乃指州縣建學、修學、遷學等過程相關記錄的學記體散文。北宋在崇文政策與三次大規模興學運動的推波助瀾下，州縣學校紛立，加速學記體散文的蓬勃發展，不僅成為有宋一代盛行的文學體裁，還樹立完善的寫作體例典範，實為今人研究宋代地方官學教育的重要文獻史料。

宋代士人致力實踐傳統儒家的治世理念，他們主張「三王四代，質文殊迹，圖治之本，惟學為先」，學校教育的建立乃是三代聖治的延續，更是三代以來治世的準則。本文乃透過梳理宋代因應各地州縣興學而作的學記體散文，析探宋代士人對三代聖治理想的嚮往、對三代聖王教化之行應置於百事之先、以學養賢、求政於學、推明治道、致君堯舜等教育與政治理念的實踐，以及對國君勵精圖治之興學政策的響應。

關鍵詞：州縣學記 宋代地方官學 回向三代 以學養賢 致君堯舜

由州縣學記析探宋代士人對 三代聖治的實踐與反思

郭玲姘

元智大學通識教學部兼任助理教授

一、前言

宋代學校有官學與私學之分，其中官學又分中央官學與地方官學。^①本文「州縣學記」^②乃指州（包括府、軍、監學）、縣等地方官學在新建、重修、改遷學校過程時，邀請當時知名的文人學士或地方官吏等所撰寫的學記體散文；其內容主要包含「敘」與「論」兩部分，「敘」主要敘述興學的過程，「論」則以闡述撰文者之教育理念、及對興學政策的想法。

近代文學家林紓（字琴南，1852-1924 年）曾指出：「學記一體，最不易

① 苗春德《宋代教育》中提到宋代主要的地方官學有兩級：「一是由州、府、軍、監設立，稱為州學、府學、軍學和監學，一是由縣設立的，稱為縣學。」見苗春德：《宋代教育》（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1999 年），頁 74。另外，袁征在《宋代教育——中國古代教育的歷史性轉折》中指出：「（宋代）每個州和縣一般分別辦有一所州學和縣學，進行大學階段的教育。……從徽宗朝開始，州縣學基本都附設了小學。崇寧三年（1104）九月，朝廷命令各地州學設立武學專業。」見袁征：《宋代教育——中國古代教育的歷史性轉折》（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 年），頁 5。

② 「學記」一名，最早始於戰國晚期《禮記》中的〈學記〉，其內容主要是闡述教育的目的與任務、教學的制度與方法、以及教師的地位與作用等，是研究古代教育的重要文獻。本文所研究的「州縣學記」，雖非指《禮記·學記》一文，但其內容實際上則是與學校教育關係緊密，是宋代散文中的記體散文。

為」，^③在現存文獻中，除《禮記·學記》篇外，與本文探討的學校興學相關之學記體散文，最早可追溯到中唐大曆九年（774年）由古文家梁肅（字敬之，752-793年）所撰寫的〈崑山縣學記〉；^④此外在《全唐文》中以「學記」為名者，還有舒元輿（字升遠，791-835年）〈問國學記〉、^⑤皮日休（字襲美，834-883年）〈襄州孔子廟學記〉^⑥兩篇。不過〈問國學記〉乃舒元輿遊歷國內太學的記文，並不符合本文主要探討的學校興學記文，故實際上唐代的興學學記，當只有〈崑山縣學記〉和〈襄州孔子廟學記〉兩篇。明代王慎中（字道思，1509-1559年）就曾指出：「蓋唐制立學不廣，不但諸家無名文，而諸家之文為學而作者亦少。」^⑦直至「（宋）慶曆詔天下立學制，始盛於郡縣；而古文之興，亦自慶曆以後，故宋人之記學者其文甚多。」^⑧由此可知，宋代慶曆興學後，各州縣地方官學紛紛設立，再加上「古文之興」，乃帶動因應州縣興學而作的「州縣學記文」之興盛，^⑨據學者劉成國依現存宋人別集、《全宋文》等文獻粗略鉤輯，宋人學記作品約四百多篇。^⑩

其次，英國著名的歷史學家湯恩比（Arnold Joseph Toynbee，1889-1975年）針對「文明的成長」曾提出：「文明的成長是創造性個人、或創造性少數人的成就……這些創造性人物，即使在人數最多的時候，亦只不過居於社會的少數而

^③ 林紓：《春覺齋論文·流別論》（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年），頁79。林紓於文中進一步提到「王臨川、曾子固極長此種（學記體）」。

^④ （唐）梁肅：〈崑山縣學記〉，收於（清）董誥等編：《全唐文》（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卷519，頁5275。

^⑤ （唐）舒元輿：〈問國學記〉，《全唐文》，卷727，頁7492-7493。

^⑥ （唐）皮日休：〈襄州孔子廟學記〉，《全唐文》，卷797，頁8354。

^⑦ （明）王慎中：《遵巖集·與汪宜齋》，收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74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卷22，頁532。

^⑧ 同前註。

^⑨ 關於北宋各州縣興學政策助長州縣學記體散文的發展之相關議題，可參考郭玲姘：〈北宋興學與州縣學記之發展〉，《高雄師大國文學報》第29期（2019年1月），頁181-212。

^⑩ 劉成國：〈宋代學記研究〉，《文學遺產》第4期（2007年7月），頁55。

已。」¹¹但這類「創造性個人」或「創造性少數人」在文明演進中，卻扮演著十分重要的主動角色，而其餘大多數人則被「創造性少數人」所帶動，扮演著被動的角色。在中國歷史文明的發展裡，「士人」即是這群所謂的「創造性少數人」。宋代由於崇文政策的推行，宋代士人之地位，更尊於以往，所扮演的角色也較以往多元，「不但是文化主體，而且也是一定程度的政治主體」，¹²是「集官僚、文士、學者三位於一身的複合型人才」，¹³不僅影響著宋代文化的發展，在政治上、社會上也佔有顯要地位，是構成宋代政治、文化的主體力量，影響深遠。

宋朝是在唐末五代以來「禮樂崩壞，三綱五常之道絕」、「干戈賊亂之世」¹⁴的態勢下立國，這樣的態勢就如同法國社會學家涂爾幹（E. Durkheim）所謂的「失範」（Anomie），¹⁵也就是失去規範。當然，社會一旦失去了規範，不僅人與人

¹¹ （英）湯恩比（Arnold Joseph Toynbee）著，陳曉林譯：《歷史研究》（臺北：桂冠圖書公司，1979年），頁442。不過，湯恩比將社會文明的成長歸功於「創造性少數人」，指出「除非先驅者能夠設計出某些方法，帶動那些懶惰的後知後覺者，在他們熱切地前進時，跟著他們一起走，否則不創造的多數人，必然會被遺落在後面，望塵莫及。」（頁442）這樣的論述卻被部分西方史學家所詬病，質疑這樣的觀點論述貶低並忽視了社會裡絕大多數成員的貢獻。

¹² 余英時：《朱熹的歷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4年），〈自序一〉，頁1。

¹³ 王水照：《宋代文學通論》（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1997年），頁27。

¹⁴ （宋）歐陽修：〈晉家人傳〉，《新五代史》（臺北：鼎文書局，1976年），卷17，頁188。

¹⁵ 法國社會學家涂爾幹（E. Durkheim）在1983年出版的《社會分工論》中首先提出「失範」概念，以為當時前資本主義社會快速發展的工業化效應下，「如果勞動分工不能產生團結，那是因為各個機構間的關係還沒有得到規範，它們已經陷入了失範狀態。」見（法）涂爾幹（E. Durkheim），渠敬東譯：《社會分工論》（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0年），頁328。另外，在該書第2版〈序言〉中進一步提到「現代經濟生活存在著的法律和道德的失範狀態……造成了經濟世界中極端悲慘的景象，各種各樣的衝突和混亂頻繁產生出來。」（頁14）後來，涂爾幹（E. Durkheim）在《自殺論》又提到：當社會被嚴重的危機（如經濟災難）或幸運的驟變（如權力和財富的突然激增）時，社會道德的規範也將暫時地消失，無法有效控制社會成員之行為；在舊的規範標準被打破、新的標準又不能立即建立，而失範的社會沒有達到新的平衡之前，各種價值觀都無一定論，可能與不可能、合理與不合理、公平與不公平之間的界限都將變得模糊；由此，人們的慾望也將失去約束，造成社會更大的動亂。見（法）涂爾幹（E. Durkheim），丘隆譯：〈脫序（無規範）型自殺〉，《自殺論》第2卷（臺北：結構群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9年），頁241-242。

之間將只求一己私欲而不擇手段，並由權力取代規範，而產生社會的動盪與人際的紛爭；此外，「失範」的社會生活，也會因失去生活的法則、價值的指引，使人產生惶恐不安狀態，而容易衍生出諸多失序的行為。因此，力圖重建規範、恢復社會秩序，不單只是趙宋王朝統治者的目標，更是「以天下為己任」的宋代士大夫因應著社會的需求而產生的一種集體意識。因此，回向「堯、舜、三代之際，王政修明，禮義之教充於天下」¹⁶的盛世，乃成宋代士人的終極理想。余英時曾提出：

無論他們是真心相信堯、舜、三代曾經出現過完美的秩序，還是借遠古為烏托邦，總之，由於對現狀的極端不滿，他們時時表現出徹底改造世界的衝動。這一思維傾向通兩宋皆然。¹⁷

正是因為「對現狀的極端不滿」，宋代士人無論是真心相信「三代盛世」的存在、或是在復古思潮下，承襲孔孟對三代、堯舜的欽慕之情，並借古以發心志、借古以革現況。總之，宋代士人在「回向三代盛治」理想的號召下，對兩宋的政治、社會與文化等領域提出諸多的革新運動，以重建社會秩序，達成超越漢、唐，直溯三代的目標。¹⁸

然而在實現「回向三代盛治」的議題上，除了強烈的美好理想憧憬與經世濟民責任感外，「如何才能實現？」更是宋代士人實際而具體必須面對的課題。筆者爬梳文獻，發現宋代士人多秉持「三代何從而治哉？其教人一於學而已。」¹⁹

¹⁶ (宋)歐陽修：〈本論·上〉，《歐陽修全集》（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75年），卷1，頁125。

¹⁷ 余英時：《朱熹的歷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頁5-6。

¹⁸ 在宋代學術研究文獻中，顯見「三代之說」確實是兩宋時期十分顯著的論述，前代所少見，本文礙於篇幅所限，未能詳述，可參考前註，第1章〈回向三代——宋代政治文化的開端〉，頁184-198。

¹⁹ (宋)尹洙：〈岳州學記〉，收於曾棗莊，劉琳主編：《全宋文》（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6年），卷587，頁37。以下所引《全宋文》皆依此版本，僅於引文後標明卷數、頁數，除有註明之必要者，不另作註。

「三王四代，質文殊迹，圖治之本，惟學為先」²⁰的信念，致力於州縣興學政策的推動。所謂「記者，史家之流也。」²¹因應州縣地方興學而撰作的「州縣學記」，不僅是宋代興學政策下發展地方學校教育的重要文獻史料，更是如同宋人焦千之（字伯強，?-1080年）〈樂清縣建學記〉文末所云：「留以俟後人而興起之，庶幾有助於政云。」（卷1701，頁141）因為兩宋州縣學記文裡記載著宋代士人對興學政策的觀點與對教育的理念，明確載錄著宋代士人對「回向三代」的嚮往，並在「圖治之本，惟學為先」的三代聖治理念上，何以學校教育得以具體實踐回向三代盛治的理想與諸多反思。因此，本文乃透過兩宋州縣學記文獻的梳理，希冀對上述諸議題有所釐清與說明。

二、宋代士人「回向三代」「致君堯舜」的政治理想

趙宋王朝是在社會風氣敗壞與宗法關係紊亂之際立國，面對五季以來的政權倏忽興亡、君臣易位、「世道衰，人倫壞」²²的種種社會亂象，讓總以「兼磨斷佞劍，擬樹直言旗」²³為自任、普遍關注政治改革的士人群體，積極地高呼回歸三代理想社會的宏大目標，自覺應該擔負起「致君堯舜」的重任，企盼能通過明君賢臣的合作，一掃五季以來的動盪與亂象，再現三代盛世之理想。然在說明宋代士人對三代聖治的實踐議題前，筆者以為有必要先闡述傳統儒家「三代」論述意涵，以及宋代士人自立國以來「超越漢唐，直溯三代」、「致君堯舜」之理想的形成。

（一）傳統儒家「三代」論述意涵

「三代」一詞，最早始見於春秋時《論語·衛靈公》：「斯民也，三代之所

²⁰（宋）余靖：〈雷州新修郡學記〉，《全宋文》，卷569，頁57。

²¹（唐）于即：〈漢源縣令廳壁記〉，《全唐文》，卷429，頁4367。

²²（宋）歐陽修：〈義兒傳〉，《新五代史》，卷36，頁385。

²³（宋）王禹偁：〈謫居感事〉，《小畜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8年），卷8，頁97。

以直道而行也。」²⁴此「三代」乃指夏、商、西周。據學者徐俊研究：秦一統天下後，「三代」除了夏、商、西周，還包含東周，並為後人所習用。²⁵不過在傳統儒家的思維中，「三代」不僅只限於夏、商、周，更要上溯取法於堯、舜；所以，在傳統儒家思維中，唐堯、虞舜二帝與夏禹、商湯、周文王、周武王與周公等聖王賢相所締造的時代乃是理想盛世之美稱。例如《論語》云：

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唯天為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為盛。」²⁶

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²⁷

上文中，孔子闡述堯舜功績，並以禮制為例，說明夏、商、周三代之歷史因革；由孔子論述可知，夏、商、周三代之間的歷史有其延續性，若能繼之，推而廣之，「雖百世，可知也」，定可將盛世延而續之。《孟子》也提到：

規矩，方員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欲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詩》云：『殷鑑不遠，在夏後之世。』此之謂也。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²⁸

²⁴ (魏)何晏注，(宋)邢昺疏，李學勤主編：《論語注疏·衛靈公》(臺北：臺灣古籍出版有限公司，2002年)，卷15，頁244。

²⁵ 徐俊：《中國古代王朝和政權名號探源》(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年)，頁37。

²⁶ (魏)何晏注，(宋)邢昺疏，李學勤主編：《論語注疏·泰伯篇》，卷8，頁118。

²⁷ 同前註，〈為政篇〉，卷2，頁25-26。

²⁸ (漢)趙岐注，(宋)孫奭疏，李學勤主編：《孟子注疏·離婁章句上》(臺北：臺灣古籍出版有限公司，2002年)，卷第7上，頁224-227。

孟子以堯、舜爲人間倫常最高境界，國君、人臣要確立行事「規矩」，關鍵在「君盡君道，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因夏、商、周三代皆法堯、舜行仁政，所以能得天下，後世不行仁政，所以失掉天下。

由孔孟論述可知，歷史是不可斷的，「古」與「今」有其連續性的關係，「在過去的史實中所蘊涵的原理，都可以對現代人具有歷久彌新的啟發。」²⁹所以，過去史實與人物都代表著某種「符號」，足以啟發現在與未來發展的無盡「意義」。因此，孔子更直接表達因循與弘揚三代聖王賢相治國之道的志向，其云：「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³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³¹自孔子以下之傳統儒家學者，亦將唐堯、虞舜，及夏、商、周三代視爲理想政治與社會的典範，是盛世的表徵，是後代帝王賢相治世的楷模。

筆者爬梳宋代士人爲地方州縣興學而撰寫的記文，亦屢見以「三代」爲盛世之表徵，以堯、舜二帝爲治世之君王典範的論述，例如北宋時，王隨（字子正，975-1033年）於仁宗天聖元年（1023年）應通州興學而撰的〈通州學記〉載：「文炳乎三宸，道包乎眾聖，比堯舜以居上，同天地而不朽。我國家開帝運，……莫不訪延才雅，崇尚經術……三代同風，萬邦咸乂。」（卷281，頁135）朱熹（字元晦，1130-1200年）在〈南劍州尤溪縣學記〉云：「二帝三王之盛所以化行俗美、黎民淳厚而非後世之所及。」（卷5652，頁49）關於宋代州縣學記裡士人對三代與堯舜禹諸聖王典範的推崇，筆者會於下文中詳細論述；然必須先行說明的是：這些聖君賢相的行爲是否爲歷史的真相，事實上並非孔子以下之傳統儒家學者所關注的重點，因爲賦予過去歷史上的聖君賢相「意義內涵」，以其嘉言懿行、良法美政爲典範，以之與現實作對比，以進行有意義的創造活動，如批判或引導不理想的當代，「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³²開創理

²⁹ 黃俊傑：〈中國古代儒家歷史思維的方法及其運用〉，收於楊儒賓、黃俊傑編：《中國古代思維方式探索》（臺北：正中書局，1996年），頁22。

³⁰ （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李學勤主編：《禮記正義·禮運》（臺北：臺灣古籍出版有限公司，2002年），卷21，頁766。

³¹ （漢）何晏注，（宋）邢昺疏，李學勤主編：《論語注疏·八佾篇》，卷3，頁39。

³² （漢）趙岐注，（宋）孫奭疏，李學勤主編：《孟子注疏·滕文公文章句下》，卷第6下，頁211。

想而美好的未來，這才是孔子以下之傳統儒家學者所真正在意的課題。誠如學者黃俊傑所述：

在古代中國思想史上，「三代」這個概念具有強烈的「非事實性」，古代思想家常運用「三代」這個概念，注入他們想注入的意義內涵，企圖以這種賦「歷史」以新意的方​​式，使歷史經驗對「現在」產生撞擊並指引「未來」。這種歷史思維方法，通貫古代中國的思想家，而以「言必稱堯舜」的儒家最為顯著。³³

質言之，傳統儒家對「三代」論述的意涵，以及對上古堯舜等聖王典範的推崇，其重點不在過去的歷史或聖王，其目的乃是欲藉由歷史與典範人物（包括具體或傳說的歷史事件，以及人物）的論述，以建立具體的普遍性理則，以批判現況，尤其是指引未來，實是對美好家國理想的表述。

（二）超越漢唐，直溯三代的政治理想

多數的宋代士人「深信六經中蘊藏著永恆的智慧，可以導向合理的政治社會秩序的重建。」³⁴因此，在學術思想領域的建構上，宋代士人勇於打破已僵化的義疏章句經學傳統，³⁵或對漢唐傳注提出懷疑與批評，或對傳世經典考辨、創新解、立新義，締造了今人所謂的疑經思潮。³⁶這股疑經思潮的興起，讓宋代士人不僅在

³³ 黃俊傑：〈中國古代儒家歷史思維的方法及其運用〉，頁 24。

³⁴ 余英時：《朱熹的歷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頁 292。

³⁵ 「儒學史上疑經思潮的湧現」可參考劉復生：《北宋中期儒學復興運動》（臺北：文津出版社，1991 年），頁 4-12。

³⁶ 錢穆《朱子學提綱》中指出：「漢儒乃經學之儒，而宋儒則轉回到子學之儒。故宋儒不僅有疑子，亦復有疑經。如歐陽修之疑十翼，劉恕蘇轍晁說之之疑周禮，此亦與漢儒之辨今古文爭家法者大不同。……宋儒之意，多貴於獨尋遺經，憂憂自造一家之言。」見錢穆：《朱子學提綱》（臺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86 年），頁 14。

學術思想上產生對漢唐章句之學的懷疑，進而建立起「宋學」³⁷新思潮，也促使在政治理想上超越漢唐，而直溯「三代」。誠如南宋葉適（字正則，1150-1223年）所述：

秦、漢崛起，天下蕩然不復堯、舜、三代之舊。其欲學者無所據依，於是始皆求之於書，而孔子之經遂行於天下。……自是以來，句斷章解，補緝壞爛，歷世數十而不能以相一。蓋至於今百有餘年之間，豪傑之士相因而起，始能推明其說，務合堯、舜、三代之舊，以無失於孔氏之遺意。³⁸

宋代士人在唐末五代動盪後立國，對亂世「不復堯、舜、三代之舊」深有所感，懷著自救圖存之心，建立適合新時代的思潮，以代替「句斷章解，補緝壞爛」僵化的舊知識，企盼能「務合堯、舜、三代之舊，以無失於孔氏之遺意」。

「三代」作為宋代士人理想社會與理想政治的代名詞，而「三代之治」不僅是宋代士人念茲在茲的理想，也是他們用來衡量現實政治的尺規，且是自宋初以來即有此思潮，例如，宋太祖開寶六年（973年）進士及第的柳開（字仲塗，948-1001年），因「生于晉末，長于宋初」，³⁹為「拯五代之橫流，扶百世之大教」，⁴⁰乃「著（書）數萬言，皆堯、舜、三王治人之道。」⁴¹他的門人張景（字晦之，970-1018年）評其施政理念即云：「天下用文治，公是以立制度，施教化，

³⁷ 錢穆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書中對「宋學」評價甚高，以為「不識宋學，即無以識近代也。」另，錢穆認為「宋學精神，厥有兩端：一曰革新政令，二曰創通經義。」並指出兩宋諸儒：「既欲一新天下之法令，而鄙薄漢唐為不足循，則經籍注疏之成於漢唐諸儒之手者，自亦無足存，而於是有所謂新經義之作。」見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6年），頁1及7。

³⁸ （宋）葉適：《水心別集·總義》，收於《叢書集成續編》第129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1年），卷5，頁820。

³⁹ （宋）張景：〈河東先生集序〉，《全宋文》，卷271，頁352。

⁴⁰ 同前註。

⁴¹ （宋）石介：〈送劉先之序〉，《全宋文》，卷625，頁281。

而建三代之治。」⁴²再如宋初石介（字守道，1005-1045年）即稱自己：「以二帝三王之書，與諸生講論。」⁴³平日更是「堯、舜、禹、湯、文王、周公、孔子之道不嘗離口。」⁴⁴除了柳開、石介等宋初著名儒者外，一般士人亦視堯、舜為「行天之教」、「行天之道」的聖人，如宋真宗咸平年間，仙游縣尉段全（生卒年不詳）為縣學成立而撰寫的記文裡即云：

天生民，天無言不能自教之，復生聖人，使行天之教。聖人不常出，故其始堯、舜焉，其終孔子焉。微堯、舜則天之道不達于人，微孔子則堯、舜之德不傳于世。（〈仙游縣建學記〉，卷 195，頁 410-411）

由此可知，宋代自立國之初，對三代之治與堯舜之道的推崇與嚮往之情已是士人們普遍存在的現象，誠如南宋朱熹的觀察：

國初人便已崇禮義、尊經術，欲復二帝三代，已自勝如唐人，但說未透在。直至二程出，此理始說得透。⁴⁵

朱熹以為的「二程出，此理始說得透」，這究竟是符合真正的史實，還是僅從學術思想的角度來論述的觀點，此文暫且先不論；然而由朱熹的觀察，不僅揭示自宋初以來，「崇禮義，尊經術，欲復二帝三代」思潮即已出現，並有超越漢唐的情形；此外，朱熹之語也透露了入宋以來儒學復興的旨趣與內在動力在於「欲復二帝三代」。

大抵上，宋代士人自宋初已來，崇禮尊經、回向三代的思潮即已開始，在「迹

⁴²（宋）張景：〈故如京使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空知滄州軍州事兵馬鈐轄兼御史大夫上柱國河東縣開國伯食邑九百戶柳公行狀〉，《全宋文》，卷 271，頁 359。

⁴³（宋）石介：〈答歐陽永叔書〉，《全宋文》，卷 622，頁 235。

⁴⁴ 同前註。

⁴⁵（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卷 129〈本朝三 自國初至熙寧人物〉，頁 3085。

治亂，通古今，子大夫之職也」⁴⁶的信念下，企盼能做到如韓琦（字稚圭，1008-1075年）在〈定州新建州學記〉中所說的「圖講萬化，益究元本，思迹三代所治之道，以仁壽其民。」（卷854，頁35-36）

（三）「致君堯舜」的理念

由於宋初的「文治」立國方針、以及「不殺大臣及言事官」⁴⁷此一君臣共守的信條確立，讓擁有至高權力的君王自願在政治議題裡，理性地選擇將部分決定權適度地讓與主事的士大夫，進而為宋代士人參與政治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除此之外，宋代士人也時有「非君臣同心，而上下協濟，則事必難成。」⁴⁸的「君臣一體」意識，積極參與政治決策。上述諸因，皆造就了宋代君臣共治天下局面的形成，讓「君臣共治」成為宋代政治結構上很突出的特點。

「共治」一詞，並不是後人對宋代政治結構的總結，而是早在宋代君臣論述中就時有所見。其中最著名者，當是宋神宗熙寧四年（1071年），文彥博（字寬夫，1006-1097年）與神宗的對話：

彥博又言：「祖宗法制具在，不須更張以失人心。」上曰：「更張法制，於士大夫誠多不悅，然於百姓何所不便？」彥博曰：「為與士大夫治天下，非與百姓治天下也。」⁴⁹

文彥博能如此明確、果斷地告訴神宗是「與士大夫治天下」，表露了宋代士人對自我定位的觀點，也揭示「君臣一體」在當時已為君臣彼此皆共存的意識。

宋代士人在「君臣一體」、「共治天下」的自我定位與政治結構裡，不僅士

⁴⁶ （宋）歐陽修：〈問進士策三首〉，《歐陽修全集》，卷2，頁162。

⁴⁷ 《宋史·曹勛傳》載：「藝祖有誓約藏之太廟，不殺大臣及言事官，違者不祥。」見（元）脫脫：《宋史》（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卷379，頁11700。

⁴⁸ （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卷163，「慶曆八年三月甲寅」條，頁3923。

⁴⁹ 同前註，卷221，「熙寧四年三月戊子」條，頁5370。

人自己崇禮尚義，矢志「回向三代」，更在「回向三代」盛治的感召下，使得「致君堯舜」的政治責任自覺意識與熱情不斷高漲；因此，「致君堯舜」的闡述自然地成了宋代士人的共同話語，時常出現，例如：

范仲淹（字希文，989-1052年）曾自述「有致君之素志，乏代天之懿功。……共理吳會之域，奉揚唐虞之風。」（〈杭州謝上表〉，卷370，頁70）秉持「上下同心，致君親如堯舜；中外有道，躋民俗于義黃。將安可久之基，必杜未然之釁。」（〈睦州謝上表〉，卷369，頁45）

石介曾提出人臣當「上以致君於堯舜之上，下以躋民於仁壽之域。」（〈南京夫子廟上梁文〉，卷17，頁26）自許之。《宋史》中記載推行改革運動的王安石（字介甫，1021-1086年）勸勉宋神宗能以堯舜為典範：

陛下當法堯、舜，何以太宗為哉？堯、舜之道，至簡而不煩，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難。但末世學者不能通知，以為高不可及爾。……陛下誠能為堯、舜，則必有皋、夔、稷、禹。⁵⁰

王安石正是以堯、舜為聖王之楷模來勸勉宋神宗，君若能效法堯、舜之道，必有如皋陶、夔、后稷和契一般的賢臣來相輔；王安石乃以此論述作為他與神宗皇帝推動政治革新的參考典範。

鄭性之（字信之，1172-1255年）在南宋理宗端平元年（1234年），召為吏部侍郎時，對理宗說：「為君者不以堯、舜自期，則無善治；告君者不陳堯、舜之道，則無遠猷。」⁵¹

由上所列文獻，可知宋代士人在論述有關歷史或政治現況時，莫不以「三代」與堯舜等聖王為典範出發；並在君王「與士大夫共治天下」、「君臣一體」的時代氛圍中，宋代士人更加自覺有責任引導君王效法二帝三王，「致其君為堯、舜

⁵⁰ （元）脫脫：《宋史·王安石傳》，卷327，頁10543。

⁵¹ （元）脫脫：《宋史·鄭性之傳》，卷419，頁12549。

之君，民為堯、舜之民，亦未嘗一日少忘於心。」⁵²成爲他們實現政治理想的至高信念，且在兩宋的州縣學記文中亦屢見不鮮，筆者將於下節中進一步詳述。

三、圖治之本，惟學為先

在前兩節的論述裡可知宋代在五季動盪後立國，士人們真切感受到重建社會秩序的迫切性，因此兩宋士人普遍「慨然有意三代之治」、⁵³矢志「致其君爲堯、舜」，企盼政治與社會秩序能超越漢唐而「回向三代」。然而在實現「回向三代」的議題上，除了強烈的美好理想憧憬與經世濟民責任感外，「如何才能實現？」當是更關鍵的課題。

對此，仁宗景祐二年（1035）五月庚子太常禮院奏言中，稱太宗能：「引搢紳諸儒，講道興學，炳然與三代同風矣。」⁵⁴質言之，要實現「回向三代」的理想，「講道興學」當是首要執行的任務。誠如仁宗朝之諫議大夫余靖（字安道，1000-1064年）於嘉祐八年（1063年）雷州（今廣東海康）新修郡學完成時，撰記曰：

三王四代，質文殊迹，圖治之本，惟學為先，閭有塾堂，巷有校室，矧有郡國，其可廢耶？本朝一祖三宗，以聖繼聖，夷落之外，威無不讐；海寓之內，澤無不浸。先皇帝頻詔郡縣謹貢條，精里選，廣生員，敞黌舍，講經義，崇儒術。（〈雷州新修郡學記〉，卷 569，頁 57）

上古三王四代秉持「圖治之本，惟學為先」治世之道，小至閭巷，大至郡國，皆有設學，故能締造「質文殊迹」之盛世；而大宋立國以來，內外安定祥和，效法

⁵²（宋）歐陽修：〈徂徠石先生墓誌銘并序〉，《歐陽修全集》，卷 2〈居士集二〉，頁 74。

⁵³（宋）呂大臨：〈橫渠先生行狀〉，《全宋文》，卷 2387，頁 185。

⁵⁴（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116，「景祐二年五月 賜天雄軍金隄、澶州橫隴埽役卒緡錢」條，頁 2733。

上古聖王興學治國之道，仁宗朝時，參知政事范仲淹等人上呈〈答手詔條陳十事〉以進行改革，其中「抑僥倖」、「精貢舉」即是主張將興學育人與科舉考試結合，於各地推動興學，廣納生員，為其講解經義、推動儒學復興。誠如范仲淹所云：

三代聖王，致治天下，必先崇學校，立師資，聚羣材，陳正道。使其服禮樂之風，樂名教之地，精治人之術，蘊致君之方；然後命之以爵，授之以政。濟濟多士，咸有一德。列于朝，則有制禮作樂之盛；布于外，則有移風易俗之善。故聲詩之作，美上之長育人材，正在此矣。（〈代人奏乞王洙充南京講書狀〉，卷 370，頁 74）

范仲淹明確指出三代聖王治天下「必先崇學校，立師資，聚羣材」，並對學子施以禮樂之教、治人之術、致君之方，讓士子們日後不管是任職朝廷或服務地方，皆能以其所學，用之於家國百姓的治理。

宋代士人對三代「圖治之本，惟學為先」治世理念的實踐，進一步落實為宋代君臣對興學政策的推動，並且反應在各地因應興學而撰作的州縣學記文中，例如：歐陽修（字永叔，1007-1072 年）於宋仁宗慶曆興學時期所撰的〈吉州學記〉提出：

學校，王政之本也。古者致治之盛衰，視其學之興廢。《記》曰：「國有學，遂有序，黨有庠，家有塾。」此三代極盛之時大備之制也。宋興，蓋八十有四年，而天下之學始克大立，豈非盛美之事須其久而後至於大備歟？（卷 739，頁 112）

歐陽修主張學校是推行王政之本，三代之所以能有盛治之美乃在學之興，爾後世道之敗壞乃在學之廢，故乃讚頌仁宗朝慶曆興學之舉實為「盛美之事」，企盼未來各地之興學能更充備。

尹洙（字師魯，1001-1047 年）於仁宗慶曆六年（1046 年）因應岳州興學而撰寫的〈岳州學記〉中提到：

三代何從而治哉？其教人一於學而已。自漢而下，風化日陵，政之寬暴，民之勞逸，皆緣於吏治。吏之治，大抵尚威罰，嚴期會，欲人奔走其命令，其馭之若是之亟也，又安暇先之以教育、漸之以德義者乎？故號稱循良，而能以學校教人者，十不一二。去聖益遠，至有持律令，主簿領，思慮不出几案，以謂為治之具盡在於是，顧崇儒術、本王化者為闕疏，不切於世。……滕公凡為郡，必興學、見諸生以為為政先。……公承認，忭曰：「天子有意三代之治，守臣述上德，廣風教，宜無大於此，庸敢不虔？」……郡人由是知孝悌禮義，皆本於學也。（卷 587，頁 37-38）

尹洙認為三代聖王因為能致力於教化百姓，使其能學習正道，故有盛世之治；而後世卻只行「吏治」，而不重視學校教人的重要性，所謂「為教之道，發號施令，嚴刑峻罰，是所謂治民，非所謂親民。」⁵⁵因此，學之廢，實是「去聖益遠」之舉。尹洙文中讚頌仁宗皇帝「有意三代之治」，能「惟學為先」，而「廣風教」，致力於各地之興學，讓郡縣之民皆本於學而知孝悌禮義。

王安石於〈慈溪縣學記〉也提到：

天下不可一日而無政教，故學不可一日而亡於天下。古者井天下之田，而黨庠、遂序、國學之法立乎其中。鄉射飲酒、春秋合樂、養老勞農、尊賢使能、攷藝選言之政，至於受成、獻賦、訊囚之事，無不出於學。……此二帝、三王所以治天下國家而立學之本意也。（卷 1408，頁 52）

王安石在文中列舉治國的大小眾事，皆立基於學校之教，故二帝三王治天下無不以「惟學為先」。相同的觀點，南宋何大奎（圭叔，1230-1279 年）於紹興七年（1137 年）作〈永春新學記〉一文中亦可見之，文曰：

竊聞古之學校始於虞舜，沿及三代，凡養老、饗賓、聽訟、取士，無不出

⁵⁵（宋）黃拱：〈仙居重修縣學記〉，《全宋文》，卷 4395，頁 53。

於學。三代長久之治，賴之以成。故其時君子常多，小人常少。（卷4283，頁194）

治理國家諸事繁多，舉凡「養老、饗賓、聽訟、取士」等，而治理之道「無不出於學」。三代之所以能長治久安，主要乃靠以學教民而成就的，故當時君子多而小人少。

綜觀上列諸篇宋代的州縣學記文所述，基於「圖治之本，惟學為先」是實現「回向三代」理想之治的首要任務，所以北宋蘇軾（字子瞻，1037-1101年）在〈南安軍學記〉中提到北宋時的興學：「朝廷自慶曆、熙寧、紹聖以來，三致意於學矣。雖荒服郡縣必有學。」（卷1968，頁413）另外，南宋唐文若（字立夫，1106-1165年）在〈安岳縣修學記〉亦說明了宋室南渡後的興學：

紹興十三年十月丙戌，有旨符郡國修學校。……國朝自慶曆以來致意於學，其教養之法備矣，得人之盛，跨越前古。暨迺者中興，相臣將臣率用儒術，主上慨然追念致理所從，首及于此，實方今治道所宜先者，天下幸甚。……學為王者事尚矣！三代而後始廢於天下，而其學於人者存也。黨庠遂序，國家治則興，否則廢，郡守賢則興，否則廢，若寒暑然。（卷4395，頁49-50）

除了北宋慶曆、熙寧、紹聖前後三次大規模的興學外，宋室南渡後亦視「學為王者事」，以興學為重。因此，兩宋之「教育系統之周密、學生數量之大、學校專業設置之多，都達到了前代遠遠不及的高峰，在中國古代教育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⁶⁶

綜觀宋代州縣學記文，實可發現宋代士人本著「圖治之本，惟學為先」乃是實踐「回向三代」理想盛治的首要任務；然更進一步，亦可發現宋代士人在州縣學記文中紛紛提出興學對國家與社會的作用，實可察見他們對三代盛治的實踐與

⁶⁶ 袁征：《宋代教育——中國古代教育的歷史性轉折》，頁3。

反思之跡；筆者爬梳文獻，彙整下列幾項內容：

（一）以學養賢，求政於學

早在西周時期，天子立辟雍行鄉飲禮和射禮，即是在大學中議論兵策與政事，⁵⁷「官府體制下，教育機構與行政機構往往是合二為一的，學校管理的許多方面借用了政權力量和行政手段。」⁵⁸使官學教育為國家長育人才、選賢與能以為治國之大業服務，有效實現求政於學的目標。所謂「國家輕重在賢材」，⁵⁹人才的培育有賴學校教育的養成；因此，學校的興立是三代聖治的延續，更是三代以下治世的標誌。誠如歐陽修所言：「建學校以養賢，論材德而取士，此皆有國之本務。」（〈議學狀〉，卷 689，頁 281）爬梳宋代州縣學記文，時可察見宋代士人企盼藉由「以學養賢，求政於學」之途，以「回向三代」之理想。

例如，孫覺（字復明，1028-1090 年）在神宗熙寧四年（1071 年）所撰的〈婺源縣建學記〉裡言曰：

三代之所以治天下，損益有所不同。至於學校以養士，鄉黨以興賢能，千數百載之間，未之有改也。先王之迹熄，下更漢、唐，仁君義主欲有為於天下，未嘗不以得士為先急。……宋興百年，仁宗皇帝始詔天下立學，蓋有意於禮樂教化之事矣。（卷 1585，頁 30-31）

孫覺以為三代之治，政策上或有差別，但是在學校養士、鄉舉里選傑出之士的制度，卻持續千數百載，未曾中斷。如今宋興百年後，能以天下立學、以推禮樂教化之事為務，實乃承續三代之治。換言之，此亦是宋代君臣對「回向三代」理想

⁵⁷ 據《禮記·王制》所載：「大學在郊，天子曰辟雍，諸侯曰泮宮。」漢代劉向於《五經通義》中載記：「天子立辟雍者何？所以行禮樂，宣教化，教導天下之人，使為士君子，養三老，事五更，與諸侯行禮之處也。」

⁵⁸ 李國鈞、王炳照主編：《中國教育制度通史》第 1 卷（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2000 年），頁 75。

⁵⁹ （宋）錢彥遠：〈賀杜相公書〉，《全宋文》，卷 410，頁 41。

的具體實踐，使得君臣同心一體致力於學校的興立之事上。

仁宗朝慶曆興學政策推行之際，范仲淹於邠州（今陝西彬縣）建學學成時，撰文曰：

國家之患，莫大于乏人。人曷嘗而乏哉？天地靈粹，賦于萬物，非昔醇而今漓。吾觀物有秀于類者，曾不減于古，豈人之秀而賢者，獨下于古歟？誠教有所未格，器有所未就而然耶？庠序可不興乎！庠序者，俊乂所由出焉。三王有天下各數百年，并用此道以長養人材。材不乏而天下治，天下治而王室安，斯明著之効矣。慶曆甲申歲，予參貳國政，親奉聖謨，詔天下建郡縣之學，俾歲貢群士，一由此出。（〈邠州建學記〉，卷 386，頁 421-422）

范仲淹認為「國家之患，莫大于乏人」，而「庠序者，俊乂所由出焉」；因此，以學校教育長養人材，人材不乏則天下治、王室安，此乃「三王有天下各數百年」之關鍵。范仲淹文中明確表達了「以學養賢，求政於學」乃是其於仁宗朝主導慶曆改革時，致力於地方州縣興學之緣由。

仁宗皇祐元年（1049 年），曾鞏（字子固，1019-1083 年）因宜黃縣縣學落成，應地方士子之請而撰〈宜黃縣縣學記〉，其云：

古之人，自家至於天子之國皆有學，自幼至於長，未嘗去於學之中。學有《詩》《書》六藝、弦歌洗爵、俯仰之容、升降之節，以習其心體、耳目、手足之舉措；又有祭祀、鄉射、養老之禮，以習其恭讓；進材、論獄、出兵授捷之法，以習其從事。師友以解其惑，勸懲以勉其進，戒其不率，其所為具如此。而其大要，則務使人人學其性，不獨防邪僻放肆也。雖有剛柔緩急之異，皆可以進之於中，而無過不及。使其識之明，氣之充於其心，則用之於進退語默之際，而無不得其宜；臨之以禍福死生之故，而無足動其意者。為天下之士，為所以養其身之備如此，則又使知天地事物之變，古今治亂之理，至於損益廢置、先後始終之要，無所不知。其在堂戶之上，

而四海九州之業、萬世之策皆得，及出而履天下之任，列百官之中，則隨所施為，無不可者。何則？其素所學問然也。（卷 1261，頁 141-142）

曾鞏文中闡述了學校包含了各種不同項目的學習內容，可以讓學子們「習其心體」、「習其恭讓」、「習其從事」，不僅讓學子們能「防邪僻放肆」，而且日常行為舉止「無過不及」、「無不得其宜」。而且縣學裡教授的內容涵蓋天下之業、萬世之策，學員若能認真學習，日後離開縣學，入仕為官，任何職務皆能勝任。上述曾鞏所言，實是「以學養賢，求政於學」的觀點。

王安石於英宗治平元年（1064 年）因虔州州學興立應地方官蔡侯、元侯之請而撰寫的〈虔州學記〉裡提出：「夫士，牧民者也。」「舉其學之成者，以為鄉大夫。」（卷 1407，頁 36 及 37）另於〈慈溪縣學記〉裡則更明確地提出「古之學」乃以「養天下智仁聖義忠和之士」，「以備公卿大夫百執事之選」，其云：

養天下智仁聖義忠和之士，以至一偏一伎、一曲之學，無所不養。而又取士大夫之材行完潔，而其施設已嘗試於位而去者，以為之師。釋奠、釋菜，以教不忘其學之所自。遷徙徧逐，以勉其怠而除其惡。則士朝夕所見所聞，無非所以治天下國家之道，其服習必於仁義，而所學必皆盡其材。一日取以備公卿大夫百執事之選，則其材行皆已素定，而士之備選，其施設亦皆素所見聞而已，不待閱習而後能者也。古之在上者，事不慮而盡，功不為而足，其要如此而已。（卷 1408，頁 52）

古之聖王之所以能「事不慮而盡，功不為而足」，實因重視學校教育，讓「士朝夕所見所聞，無非所以治天下國家之道」，再以學校培育的賢能之士成為「公卿大夫百執事之選」，擔任四海九州之「牧民者」，使其將平時學校所學智識技能無縫接軌於國家社會治理的事務上，故「堯、舜、三代，從容無為，同四海於一堂之上，而流風餘俗詠歎之不息。」⁶⁰

⁶⁰ （宋）王安石：〈虔州學記〉，《全宋文》，卷 1407，頁 37。

顯然三代聖王治國之基礎乃在興學，以學養士，再以賢能之士牧民、治國。對此，蘇軾在〈南安軍學記〉中即明確提出要實現三代聖治的理想，不可能僅憑王政，而是要靠「取士論政」，其云：

古之取士論政者，必於學。有學而不取士、不論政，猶無學也。學莫盛於東漢，士數萬人，噓枯吹生。自三公九卿，皆折節下之，三府辟召，常出其口。其取士論政，可謂近古，然卒為黨錮之禍，何也？曰：此王政也。王者不作，而士自以私意行之於下，其禍敗固宜。（卷 1968，頁 413）

在蘇軾看來，士必取於學，有學而不以學養賢能之士、舉賢能之士論政，那麼這樣的「學」是沒有存在必要的。再以東漢為例，東漢學盛，本可藉「取士論政」締造上古盛世之況，卻因「王者不作」，中央政府力量薄弱，大權旁落外戚與宦官，黨錮之禍後，士人論政見解只能私下表述，無法上傳君王，乃至對朝政寒心，不再進言，朝政最終敗亡是必然的。因此，蘇軾認為「學」能為社會國家培育賢能之「士」，提供具有知識與實力的管理人才，「士取於學」，進而取士、論政，國家政治方能穩定發展。

蘇軾於神宗元豐五年（1082 年）應上高縣令李懷道之請而作〈上高縣學記〉中亦從「學政」觀點進行闡述：

古者以學為政，擇其鄉閭之俊而納之膠庠，示之以詩書禮樂，揉而熟之，既成使歸，更相告語，以及其父子兄弟。故三代之間養老、饗賓、聽訟、受成、獻賦，無不由學。習其耳目，而和其志氣，是以其政不煩，其刑不瀆，而民之化之也速。（卷 2095，頁 173）

蘇軾言「古者以學為政」即言三代之治乃學政合一，擇鄉閭優秀之士教之詩書禮樂，待其學成返鄉「更相告語」，使其父子兄弟、鄰里之人亦知詩書禮樂。質言之，此乃是求政於學、寓政於教，也就是讓百姓日常生活裡就通過「習其耳目，而和其志氣」，耳濡目染中習得詩書禮樂之教，進而締造三代祥和的政治局面。

反之，若學廢，則士「不知務本」，將無法求政於學，而無補於國事。此則可以在何大奎於南宋高宗紹興七年（1137年）〈永春新學記〉中觀之：

春秋之世，王澤衰微，子產猶知鄉校之不可毀，蓋去古未遠也。逮至暴秦，盡掃除之。漢雖尊尚儒術，而學校僅興於蜀。東漢猶未盛焉。唐之學名存而實去，終莫盛於三代。士於是時，不知務本。仁義既廢，政不出於學，學無補於國，求所謂忠厚長久之治，非學校無以教天下。此永春新學之所以興也。今仁聖勵精求治，真堯舜三代之王。（卷 4283，頁 194-195）

何大奎在文中除了指出春秋、秦、漢、唐等朝，因學廢而無以教天下的情形之外，也進一步提出學之本在仁義之教，學廢而士不知本，政、學分離，無益於國家政事與人才的培育，想要追求長治久安，實為難事。因此，何大奎在文中讚頌高宗能「勵精求治」，致力興學，乃是沿襲三代聖王之治。

張孝祥（字安國，1132-1169年）於南宋孝宗乾道元年（1165年）為衡州（今湖南衡陽）新建州學而撰之記曰：

先王之時，以學為政，學者政之出，政者學之施，學無異習，政無異術。自朝廷達之郡國，自郡國達之天下，元元本本，靡有二事。故士不於學，則為奇言異行；政不於學，則無道揆法守。……後世之學，蓋盛於先王之時矣。居處之安，飲食之豐，訓約之嚴，先王之時未必有此；然學自為學，政自為政，……後世言治者常不敢望先王之時，其學與政之分與！……蓋欲還先王之舊，求政於學。（〈衡州新學記〉，卷 5703，頁 111-112）

張孝祥以為先王盛世之關鍵乃在「以學為政，學者政之出，政者學之施」，而後世之學，資源上更豐厚於先王之時，可是卻因「學」「政」分離，而不敢奢望達到先王之盛世。故在〈衡州新學記〉文末，張孝祥特別提出：「欲還先王之舊，求政於學」，「使政之與學復而為一，不惟三君（衡州三位官吏：王彥洪、鄭丙、

張松)之望如此,抑國家將於是而有獲與!」(卷5703,頁112)質言之,若能全國致力興學,並做到「求政於學」,使學與政合一,國家必能受益,恢復三代盛治之望即不遠矣。

綜上所述,在宋代的州縣學記文中,時可見宋代士人回向三代盛治的理想,並可從中窺見宋代士人提出具體實踐之法乃在致力於學之興,唯有以學「養天下智仁聖義忠和之士」,以為日後牧民、治國之選,乃能契合上古三代聖王「學政合一」「求政於學」的理念,方能達成長治久安的理想。

(二) 明人倫,厚風俗

趙宋立國之初,方結束五季干戈紛擾,面對社會秩序失調、道德倫常失序、價值理想失衡,繼衰而起的趙宋王朝士人正處在重建理想社會型態與道德人格的時代需求氛圍中,並在「科舉文化的政治體制下,蘊育了大批兼具天下觀念與關懷鄉土雙重性格的士大夫」,⁶¹他們以整飭社會風氣、重整道德倫常為己任,本著「圖治之本,惟學為先」的理念,企盼透過各地興學,以學興教化之事,重建社會秩序。《宋史·太祖本紀·贊曰》稱:

三代而降,考論聲明文物之治,道德仁義之風,宋於漢、唐蓋無讓焉。⁶²

論聲明文物之治、行道德仁義之風,宋人實有超越漢、唐,直溯三代的志向。然而如何具體實現,「必由學乎」。因為早在《禮記·學記》即提出:

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為先。⁶³

⁶¹ 黃寬重:〈從中央與地方關係互動看宋代基層社會演變〉,《歷史研究》第4期(2005年7月),頁117。

⁶² (元)脫脫:《宋史·太祖本紀》,卷3,頁51。

⁶³ (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李學勤主編:《禮記正義》,頁1224-1225。

上古聖王教化百姓、敦厚風俗，必以「教學為先」，因為「人不學不知道」。誠如李觀（字泰伯，1009-1059年）云：

昔三代之人，自非大頑頓，盡可以為君子。何者？仁義禮樂之教浸淫於下，自鄉徂國則皆有學。師必賢，友必善，所以養耳目鼻口百體之具，莫非至正也。（〈與章秘校書〉，卷 892，頁 337）

因三代重視庠序之教，「自鄉徂國則皆有學」，使百姓日常言行舉止浸染於仁義禮樂之教，故人人皆可為君子。再如，陳宓（字師復，1171-1230年）於南宋理宗寶慶三年（1227年）為泉州南安縣新建縣學所撰的記文裡，亦有相同之論述：

三代盛時，自家至國，莫不有學。自天子之元子與諸侯、大夫、士、庶人之子，莫不入學。當時弦誦之聲相屬於都鄙鄉黨。孝弟忠信、禮義廉恥，家傳而人習也。（〈泉州南安縣新學記〉，卷 6965，頁 199）

三代盛時，上至天子之元子，下至庶民百姓之子，無不入於學；其所學的內容著重在人倫、德性之教，由家至國，人人皆浸染於此氛圍中。

由此，宋代士人在實踐回向三代盛治的理想時，本著「圖治之本，惟學為先」的前提，在其為州縣興學而撰寫的學記文中，闡述學校教育的功能與任務時，常以明人倫、厚風俗為當世之急務。誠如李防（字智周，生卒年不詳）於仁宗寶元元年（1038年）知台州（今臨安，古又稱丹丘州），與台州通判李晉卿、臨海縣令范貫之創建台州州學，州學成乃撰文紀念，文中云：

三代之所以明人倫，厚風俗者，設庠序之效也。……歷代聖賢，垂諸典訓，未始不以勸學為先。蓋學然後知道，知道然後立身，立身然後從政，從政然後致主。非其學，則仁、義、忠、信、孝、弟、禮、法，從何入焉？既不以聖賢之道入乎心、潤乎性，則空空焉縱其心、放其志，事親則昧其孝，事君則昧其忠，臨民則昧其教。由是而言，學者生民立身事主之大本，為

世之急務也，可不在心乎？（〈丹丘州學記〉，卷 195，頁 404-405）

因爲不「學」無從知「道」，仁義忠信孝弟禮法、聖賢之道皆無法入於人心，所以透過庠序之教以明人倫、厚風俗，乃爲當世之急務。

再如，張栻（字敬夫，1133-1180 年）在〈袁州學記〉所云：

惟民之生，其典有五，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是也；而其德有四，仁、義、禮、智是也。人能充其德之所固有，以率夫典之所當然，則必無力不足之患。惟人之不能是也，故聖人使之學焉。自唐虞以來，固莫不以是教矣，至於三代之世，立教人之所，設官以董蒞之，而其法益加詳焉。然其所以爲教則一道耳。故曰：「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嗟夫！人倫之在天下，不可一日廢，廢則國隨之。然則有國者之於學，其可一日而忽哉！（卷 5739，頁 355-356）

自三代以來，乃透過庠序之學以教化百姓，使其能明人倫之序、具仁義禮智之德，所謂「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廢則國隨之，故「圖治之本，惟學爲先」，而學習的內容則不可忽視人倫之教。「大抵古者教學之意緩而不迫，所以勸善興化，養賢勵俗，在於遲久，而不求近效急功也。」⁶⁴因此，曾鞏〈宜黃縣學記〉中提出教化的極至乃是使天下之人在自然而然、無須強迫的氛圍中，「相與學而明之」，其云：

雖古之去今遠矣，然聖人之典籍皆在，其言可考，其法可求，使其相與學而明之，禮樂節文之詳，固有所不得爲者。若夫正心修身，爲國家天下之大務，則在其進之而已。使一人之行修移之於一家，一家之行修移之於鄉鄰族黨，則一縣之風俗成，人材出矣。教化之行，道德之歸，非遠人也，可不勉與！（卷 1261，頁 143）

⁶⁴（宋）歐陽修：〈議學狀〉，《全宋文》，卷 689，頁 283。

雖然三代盛治去今已遠，「然聖人之典籍皆在」，可透過地方的興學以教之，由一人、一家、一鄉、一縣、至一國，點點浸染，將個人的影響擴及至國家整體，讓天下之人皆能自然而然、毫無壓迫下，遵守禮節、服從制度，久而厚於善，人倫風俗乃美矣。

相同的觀點，在黃元（生卒年不詳，哲宗元符三年進士）的〈中江縣修學宮記〉中亦云：

古人有言，化民成俗，其必由學。觀三代而上，庠序學校殆徧於鄉里州黨之間。夫豈不知養民者莫先乎桑麻稼穡，治民者莫急乎簿書獄訟，而乃皇皇焉篤意於此，寧或後其所先而緩其所急，何耶？蓋以謂道德性命出於天理，非學不能造其原；詩書禮樂具於人文，非學不能該其末。舍是而望教化之行，未見其可也。（卷 3058，頁 123）

黃元認為人人皆知養民以生存之要件無非在「桑麻稼穡」等農耕務上，而治理百姓使其服從的快速之法則在「簿書獄訟」；然而三代聖王卻將諸事暫緩，而篤意於庠序之教，乃是因為深知道德性命是自然而然、永恆存在的，若不通過學習，無法認識生命本源；故教民學習禮、樂、詩、書等古聖先賢大智慧，正是以人文教化取代「簿書獄訟」的治民良方。質言之，學校教化之事應置於治民百事中之首。誠如李堯臣在〈保州重建州學之記〉裡的論述：「教化與學通塞，學與教化廢興。知此則知所以治民矣。」（卷 1708，頁 285）

綜上所述，所謂「教化之本，自學校始；學校之興，自鄉遂始。」⁶⁵宋代士人因應州縣興學而撰寫的學記文中，除了倡議孟子「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的理念，透過學校平時的教導將「人倫之教、聖賢之言行薰濡之以漸，由耳目以入其心志」，⁶⁶毫無壓迫下，點點浸染，締造人倫之明、風俗之厚的理想家國；再者，更企盼能透過學校之教將「孝弟之行，始乎閭門而形於鄉黨；忠愛之實，見

⁶⁵（宋）余靖：〈惠州海豐縣新修文宣王廟記〉，《全宋文》，卷 569，頁 60。

⁶⁶（宋）張栻：〈欽州學記〉，《全宋文》，卷 5739，頁 362。

於事君而推以澤民。是則無負於國家之教養，而三代之士風亦不越是而已。」⁶⁷質言之，當士子們能將孝弟之行由閨門擴及於一鄉一黨，並以忠愛之心事君澤民，那麼實已直溯三代之士風了。

（三）推明治道，致君堯舜

宋興以來，「國家鑑三代典章」，⁶⁸「開設學校，惟周孔之教是明，惟堯舜文武之道是適。」⁶⁹而「周孔之教」「堯舜之道」藏之於六經。對宋代士人而言，「四代之學，考諸經可見已！」⁷⁰所以，早在北宋初年，孫復（字明復，992-1057年）即曾云：

然則虞夏商周之治，其不在於六經乎？捨六經而求虞夏商周之治，猶泳斷湟污瀆之中望屬於海也，其可至哉？（〈寄范天章書·之二〉，卷401，頁290）

因此，「宋初多數儒者都深信六經中蘊藏著永恆的智慧，可以導向合理的政治社會秩序的重建。」⁷¹誠如南宋朱熹所云：

如二程未出時，便有胡安定、孫泰山、石徂徠，他們說經雖是甚有疏略處，觀其推明治道，直是凜凜然可畏！⁷²

可知宋儒說經的重點在「推明治道」。因此，范仲淹在〈上時相議制舉書〉中主張：

⁶⁷（宋）張栻：〈袁州學記〉，《全宋文》，卷5739，頁356。

⁶⁸（宋）夏竦：〈慎爵祿策〉，《全宋文》，卷345，頁42。

⁶⁹（宋）周必大：〈萬安縣新學記〉，《全宋文》，卷5149，頁239。

⁷⁰（宋）李覯：〈袁州學記〉，《全宋文》，卷914，頁303。

⁷¹余英時：《朱熹的歷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頁292。

⁷²（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83〈春秋·經〉，頁2174。

夫善國者，莫先育材，育材之方，莫先勸學，勸學之道，莫尚宗經。宗經則道大，道大則才大，才大則功大。蓋聖人法度之言存乎《書》，安危之幾存乎《易》、得失之鑑存乎《詩》、是非之辯存乎《春秋》，天下之制存乎《禮》，萬物之情存乎《樂》。故俊哲之人，入乎六經，則能服法度之言，察安危之幾，陳得失之鑑，析是非之辯，明天下之制，盡萬物之情。使斯人之徒輔成王道，復何求哉！（卷 381，頁 293）

基本上，范仲淹乃秉持「圖治之本，惟學為先」的治世理念，進一步提出興學之道，「莫尚宗經」，也就是學習的內容必須以六經為主，因為「聖人法度之言」皆在六經之中；「宗經則道大，道大則才大，才大則功大」，學子以六經為學習之道，方能培育服法度、察安危、陳得失，析是非的「俊哲之人」，終能「推明治道」成為「輔成王道」之士。

同范仲淹之觀點，南宋胡寅（字明仲，1098-1156年）於〈岳州學記〉中先提出「學之失有五」：「溺於名數者」「囿於訓詁者」「役於記誦者」「耽於文詞者」「惑於異端者」，然後再進一步指出：

豪傑之士慨然自拔於流俗，曰道德性命聖人之奧也，豈是五者之謂哉！……天子聞焉，乃詔中外興復庠校，罷三傳，出問目，以尊經世之書；退詩賦，厭彫篆，以隆六籍之訓。……以《詩》理性情而養性，以《書》監古而決今，以《易》從道而隨時，以《春秋》正己而正物，心日廣，體日胖，德日進，業日修，用則致君堯舜，措俗成康，舍則獨善其身，不願乎外。（卷 4181，頁 72-73）

顯然有志「回向三代」倡言「道德性命聖人之奧」的宋代君臣，要避免「學之五失」的情形，乃紛紛提出為學之道首在「尊經世之書」、「隆六籍之訓」，一旦出而立朝，則能推明治道，「致君堯舜，措俗成康」，重建社會、文化秩序，回向三代盛治；不然也能獨善其身、行不踰矩。

韓琦於仁宗至和元年（1054年）為并州（今山西太原）新修的廟學撰文云：

蓋言堯、舜莫賢其德，而社稷莫偕其尊。誠哉！後之學者雖欲極言而增大之，又孰加焉。唯郡縣守長得施其教者，能興學以恢其德，崇廟以稱其尊，斯可以達其本者也。……夫廟學之新，其於為治之道，竊有志達其本者，而諸生其達學之本乎！今飾公齋，萃公書，潔公食，日授經，月課文。昧其教者苟曰：此欲吾藝之精，取進士科，富且貴而已。噫！如是，則吾學乃教人竊祿之地，非有望於諸生也。夫精藝而求仕，末也；得仕而行道，本也。然不由其末，則不得施其本。故由末而仕，其末不可用而本或不存焉，非竊祿何哉？且晉之俗，陶唐氏之俗也；吾夫子之道，二帝三王之道也。……今學興矣，處吾學者，其務外勤於藝，而內志於道，一旦由茲而仕也，則思以其道為陶唐氏之臣，心陶唐乎其君，心陶唐乎其民。能如是，吾始謂之達其本。（〈并州新修廟學記〉，卷 854，頁 40-41）

韓琦以為堯舜為人尊崇者乃在其德性，故今州縣首長興學當「以恢其德」為學之本。如果學校興學只是教諸生科考之技能，那麼學校就淪為只是「教人竊祿之地」，未來是難以指望諸生士子能對國家社會秩序之重建有所作為。反之，若學校之教，能教導學生們本於「二帝三王之道」，「外勤於藝，而內志於道」，重視德行修為的培養，一旦出任官職，則能「思以其道為陶唐氏之臣，心陶唐乎其君，心陶唐乎其民」，由內聖推至於外王，推明治道，致君澤民。

再如，余靖在仁宗嘉祐八年（1063 年），雷州（今廣東海康）郡學完成，撰文勉士子云：

將俾其稽古力行，以孝顯其親，以道致其君，不徒習威儀考聲病而已。今天子紹堯、舜之明，內修曾、閔之行，總攬權綱，旁求俊乂，固應弛弓旌、空巖穴以收四方秀茂之傑，益闡先王夷易之道也。諸生當體賢太守之意，以副國家崇學求賢之詔也。（〈雷州新修郡學記〉，卷 569，頁 57）

余靖文中不僅稱頌仁宗能繼承堯、舜之聖明，效法曾參、閔子騫之德性修為，並能廣興學校，求四方俊傑賢能之士，以作為治國之正道；因此，余靖鼓勵雷州士

子們應當體會太守實踐朝廷「崇學、求賢」詔令的用心，要能「稽古力行」，充實內在德性修為，不能只著力在科第應試項目的學習，未來方能「以孝顯其親，以道致其君」。

相同觀點的論述，還有南宋何大奎於永春（今福建永春）新學興建後，撰記讚頌主事興學的縣官曰：

方侯新興學校，倡明教化，諸生思侯之意，豈為記問章句、徒事空言而已？始於身，行於家，達於天下，正心誠意，致君於二帝三王之上，則侯之意也。（〈永春新學記〉，卷 4283，頁 195）

以及南宋張孝祥在〈衡州新學記〉中讚揚衡州（今湖南衡陽）士子們：

凡衡之士，知三君之心，則居是學也，不專章句之務，而亦習夫他日所以為政；不但為科第之得，而思致君澤民之業。（卷 5703，頁 112）

兩位南宋士人皆提出學校之教不當專力於「記問章句、徒事空言」而已，學習的內容除了要能修己立身外，更要能進而「行於家，達於天下」，「致君於二帝三王之上」；學習思考的重點則在如何以推明治道，以成就「致君澤民」之大業。

綜上所述，宋代士人在「圖治之本，惟學為先」的前提下，本著「六經與世上下，世與六經薄厚」⁷³的觀點，紛紛主張學校教學內容不當專於詞章詩賦之學，士子們學習也不當以科第之業為竭力的目標；因為三代聖王賢相之智慧皆記錄於六經之中，故學校教育的內容應當以說經為主，說經的目的乃在推明治道，要為國家培育能「致君堯舜」「致君澤民」的賢能俊傑之材，所謂「一旦出而立朝，致君澤民，事業可大，則三代之風何遠之有，豈不盛歟！」⁷⁴

⁷³ （宋）李堯臣：〈保州重建州學之記〉，《全宋文》，卷 1708，頁 285

⁷⁴ （宋）張栻：〈郴州學記〉，《全宋文》，卷 5739，頁 359-360。

四、結語

瑞士心理學家榮格（Carl Gustav Jung，1875-1961年）曾說：「人類是真的需要堅定信仰和普遍觀念，讓他的生命獲得意義，讓他在宇宙間找到安身立命的位置。」⁷⁵誠如榮格所言，宋代士人對聖人、盛世形象的建立正是基於他們內心確認的某種堅定信仰與被視為普遍觀念的象徵。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為代表的聖人典範與其國家治理的盛治風範，雖非宗教，卻仍屬於一種信仰體系，是「以天下為己任」的宋代士人畢生致力的理想目標。所以，儘管三百多年的歷史裡，宋代士人時有因政治觀點的不同，致使黨爭不斷，但他們所抱持的淑世情懷、重建社會秩序、再造盛世的理想卻別無二致；而堯、舜二帝三代聖王賢相所締造的「三代盛世」，便是這群急於走出五季動盪陰霾，重建社會秩序、安頓國家體制的士大夫們最常援引並注入新意涵以批判現況、指引未來的重要典範。所以錢穆曾評述宋代士人時說：

他們用明白樸質的古文，來推翻當時的文體。他們因此闢佛老，尊儒學，尊六經。他們在改制上，幾乎全體有一種革新的要求。他們更進一步看不起唐代，而大呼三代上古。他們說唐代亂日多、治日少。⁷⁶

宋代士人希望超越漢唐，「大呼三代上古」，以重建合乎儒家安頓家國的體制與理想的人間秩序。

因此，宋代士人多抱持著「治安百年，聲明文物，比隆三代。」⁷⁷與「致君堯舜」的政治理想，以重建家國秩序；而「天下之事，無大小莫不有法，法莫不源

⁷⁵ （瑞士）榮格（Carl G. Jung）著，龔卓軍譯：《人及其象徵》（臺北：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9年），頁88。

⁷⁶ 錢穆：《國史大綱》（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09年），頁560。

⁷⁷ （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181，「仁宗至和二年九月辛巳」條，頁4375。

於古，根於學。」，⁷⁸再者「古之取士皆本於學校，其人材皆足以有為於世。」⁷⁹故本著「圖治之本，惟學為先」、⁸⁰「圖當世之務，而以學為先。」⁸¹的理念，宋代士人不僅致力於地方興學政策的推動，也在因應各地興學而撰作的學記體散文中，紛紛提出興學對國家與社會的助益，其中更得以窺見宋代士人希冀透過地方學校教育的實行，以達成對三代盛治的實踐與教育理念的反思，筆者於文中彙整為「以學養賢，求政於學」、「明人倫，厚風俗」、「推明治道，致君堯舜」等議題以進行闡述。

總論之，在兩宋的州縣學記散文中，實可見宋代士人提出以學校教化作為治國治民百事之首的教育理念，並且多秉持「將俾其稽古力行，以孝顯其親，以道致其君，不徒習威儀考聲病而已」⁸²的觀點，勉勵地方學子以六經為學習之道，能「退詩賦，厭彫篆，以隆六籍之訓」，⁸³成為能推明治道、致君堯舜的賢能俊傑之士。唯有各地學校興立，再現「禮義興行，人才眾多，風俗醇厚，至於斑白者不負戴於道路，而王道成矣。」、⁸⁴「王道大洽，人文化成，士有常心，家無殊俗」⁸⁵的太平盛世，那麼「三代之盛，安知不由今而見於他日乎！」⁸⁶綜上所述，在宋代因應各地州縣興學而作的學記體散文中，除可清晰窺見宋代士人對「回向三代」之美好的憧憬，以及在達成「回向三代盛治」的具體實踐之法與教育理念諸議題的反思外，藉由本文對州縣學記文的梳理，亦可發現宋代士人們為地方興學而撰寫的學記散文更是崇文政策下，發展地方教育的重要文獻史料，實為研究宋代士人政治與教育理念不容忽視的文獻。

⁷⁸ (宋)李堯臣：〈保州重建州學之記〉，《全宋文》，卷1708，頁285。

⁷⁹ 同前註。

⁸⁰ (宋)余靖：〈雷州新修郡學記〉，《全宋文》，卷569，頁57。

⁸¹ (宋)曾鞏：〈宜黃縣學記〉，《全宋文》，卷1261，頁142。

⁸² (宋)余靖：〈雷州新修郡學記〉，《全宋文》，卷569，頁57。

⁸³ (宋)胡寅：〈岳州學記〉，《全宋文》，卷4181，頁72。

⁸⁴ (宋)張栻：〈郴州學記〉，《全宋文》，卷5739，頁359。

⁸⁵ (宋)孫覿：〈臨安府臨安縣學記〉，《全宋文》，卷3480，頁375。

⁸⁶ (宋)陳宥：〈泉州南安縣新學記〉，《全宋文》，卷6965，頁200。

徵引書目

一、傳統文獻

- (漢) 趙岐注，(宋) 孫奭疏，李學勤主編：《孟子注疏》(臺北：臺灣古籍出版有限公司，2002年)。
- (漢) 鄭玄注，(唐) 孔穎達疏，李學勤主編：《禮記正義》(臺北：臺灣古籍出版有限公司，2002年)。
- (魏) 何晏注，(宋) 邢昺疏，李學勤主編：《論語注疏》(臺北：臺灣古籍出版有限公司，2002年)。
- (宋) 王禹偁：《小畜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8年)。
- (宋) 歐陽修：《歐陽修全集》(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75年)。
- (宋) 歐陽修：《新五代史》(臺北：鼎文書局，1976年)。
- (宋) 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
- (宋) 葉適：《水心別集》(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1年，《叢書集成續編》第129冊)。
- (宋) 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北京：中華書局出版，1986年)。
- (元) 脫脫：《宋史》(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
- (明) 王慎中：《遵巖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74冊)。
- (清) 董誥等編：《全唐文》(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

二、近人論著

(一) 專書

- 王水照：《宋代文學通論》(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1997年)。
- 李國鈞、王炳照主編：《中國教育制度通史》(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2000年)。
- 余英時：《朱熹的歷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4年)。
- 林紓：《春覺齋論文》(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年)。

- 苗春德：《宋代教育》（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1999年）。
- 袁征：《宋代教育——中國古代教育的歷史性轉折》（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
- 徐俊：《中國古代王朝和政權名號探源》（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年）。
- 曾棗莊，劉琳主編：《全宋文》（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6年）。
- 楊儒賓、黃俊傑編：《中國古代思維方式探索》（臺北：正中書局，1996年）。
- 劉復生：《北宋中期儒學復興運動》（臺北：文津出版社，1991年）。
- 錢穆：《朱子學提綱》（臺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86年）。
- 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6年）。
- 錢穆：《國史大綱》（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09年）。
- （法）涂爾幹（E. Durkheim），丘隆譯：《自殺論》（臺北：結構群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9年）。
- （法）涂爾幹（E. Durkheim），渠敬東譯：《社會分工論》（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0年）。
- （英）湯恩比（Arnold Joseph Toynbee）著，陳曉林譯：《歷史研究》（臺北：桂冠圖書公司，1979年）。
- （瑞士）榮格（Carl G. Jung）著，龔卓軍譯：《人及其象徵》（臺北：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9年）。
- （二）期刊論文
- 黃寬重：〈從中央與地方關係互動看宋代基層社會演變〉，《歷史研究》第4期（2005年7月），頁100-117及191。
- 郭玲姪：〈北宋興學與州縣學記之發展〉，《高雄師大國文學報》第29期（2019年1月），頁181-212。
- 劉成國：〈宋代學記研究〉，《文學遺產》第4期（2007年7月），頁53-60。

The Practice and Reflection of the Scholars of the Song Dynasty on the Three-Generation Sage Rule from the Proses in the Proces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Local Official School

Kuo, Ling-Feng

Adjunct Assistant Professor, College of General Studies, Yuan Ze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records of learning in prefectures and counties refer to the proses recorded in the process of the establishment, revision and relocation of learning in prefectures and counties. 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with the help of the policy of worshipping literature and the three large-scale campaigns to build schools in the states and counties, the vigorous development of learned prose not only became a popular literary genre in the Song Dynasty, but also set up a perfect model of writing style. It is an important historical document for modern people to study the education of local government in Song Dynasty.

The scholars of the Song Dynasty were committed to the traditional Confucian philosophy of governing the world. They advocated that “three kings and four generations of the people should be governed by learn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school education was the continuation of the three generations of sage rule and the rule of governing the world since the three generations. This paper is a review of the scholarly prose of the Song Dynasty, which was written in response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schools

in various states and counties. In Song Dynasty, the scholars' yearning for the ideal of three-generation sage governance, the education of the three-generation sage king should be put in the first place, the practice of the education and politics idea such as the way of learning to cultivate talents and helping emperor become sage king Yao and Shun, and the response to the policy of the emperor of the Song Dynasty.

Keywords: the Proses in the Proces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Local Official School, Song Dynasty Local Official School, Back to the Three-Generations, Cultivating Talented Persons through School Education, Help Emperor Become Sage King Yao and Shun